

hanyu xiuci de dangdai chanshi

汉语修辞的 当代阐释

ANYU XIUCI DE DANGDAI CHANSHI

江南 著

JIANG NAN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kuangye daxue chubanshe

汉语修辞的当代阐释

江南 著

胡修琦先生

雅正

江南 2002.3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06CPA2001

责任编辑 王德福

汉语修辞的当代阐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修辞的当代阐释/江南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1. 12

ISBN 7 - 81070 - 477 - X

I . 汉... II . 江... III . 汉语—修辞 IV .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241 号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徐州 邮政编码 221008)

出版人 解京选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50 册 定价 19.80 元

序

宋廷虎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早在 1980 年就曾经指出我国语言学界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说（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言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怎么使唤这种工具。”^① 吕先生说的是“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当然包括了修辞学书籍在内。几十年来，我国修辞学界存在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在重视修辞的静态研究，即重视“部件和结构”研究的同时，比较忽视人是“怎样使唤这种工具”的动态研究。这一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按理说，修辞学是一门最应该总结

① 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读书》1980 年第 4 期。

出“人怎样使用语言”的种种规律的学科，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过去的研究多半忽略了这一点。^①前不久读了胡佑章《用词法探索》书稿（即将由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作者也邀我写序），深感是一本力图对吕先生所指问题进行解答的佳作。最近接到江南电话，说她写了一本专著，希望我为之作序。接着又收到这本《汉语修辞的当代阐释》书稿。打开扉页，好像有一股欲罢不能的欲望紧紧抓住了我，迫使我放下手头纷繁的杂务，先把书稿通读了一遍。越读越觉得这是又一本试图扭转吕先生所提问题的力作，而且角度与胡所著又有不同；同时，此书还让我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这就引发我回忆起与江南的交往。近十年联系的历史似乎有一特点：都是围绕文学语言这一课题展开的（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与全国许多中青年修辞学研究者都有着较为频繁的联系，江南就是其中之一。但交往内容始终集中在文学语言这一角度的，似乎她是惟一的一个）。表现之一是：多年来她希望我为之推荐到《修辞学习》杂志发表的，全是从不同视角撰写的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表现之二是：1994年，她提交给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也是一篇关于文学语言的长篇论文，其中有的观点受到了有关学者的批评；我则有感于文章论点的新颖，在大

^① 请参阅拙文《汉语修辞 20 年的回顾与 21 世纪前瞻》，刊中国修辞学会编：《迈向 21 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会上发言为之辩护。通过争论，我对她执着于文学语言探索，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表现之三是：2000年，江南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来复旦大学当了我一年的“访问学者”，带来的研究课题还是有关文学语言的。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此孜孜不倦地专攻文学语言这一课题，一定会、也应该有系统的成果问世。果然，她离开复旦仅一年多，就托人捎来了这本全面探讨新时期文学语言新变，并对之进行较为系统地阐释的书稿。其中有些章节的论点，我还记忆犹新，从中能找到以往读过的她那些系列论文的影子。——这大约就是让我产生亲切感的由来吧！由此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也是一条真理：积之十年，持之以恒，刻苦钻研，必能成一学者！江南的成功之路，难道不是又一次证明吗？

二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比较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新时期文学语言的新变化、新特点。这又可从以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考察。

(一) 对新时期新潮作家新的文学观、语言观、修辞观的全面总结

本书作者首先指出：新时期乃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我国又一次大开放、大变革时期，作家的文学观、语言观、修辞观，在西方有关思潮的影响下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文

学观念方面，“出现了由重反映论向重表现论的转化，由重内容向关注艺术形式的转化，由重描写现实向重描写心理的转化，由重理性同时向注重非理性的转化”^①。在语言观、修辞观方面，由于受 20 世纪西方思想界“语言论转向”的影响，我国的新潮作家也已不仅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同时还把它视作本体，看成“人类的家园”。许多作家认为：语言就是文学的内容，文学语言是一种自指的语言，作家可以将语言形式作为自己的惟一对象。还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引导读者通往现实世界的通道，语言形式本身就是目的。许多作家突出语言的虚拟性，强调语言的错位、变形、新奇，力图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汉语的声音和文字上来，让他领略到汉语言文字之妙；同时，通过语言形式把一些情绪、感觉传染给读者。他们或者通过瓦解文本的内容和意义来强调语言形式；或者注重语音形式的营造，像刘索拉、莫言、何立伟等，都非常重视突出语音形式在传达情感、感觉时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则通过变换标点、重视组合文字形式，在视觉上和语感上创造一种新颖、别致的效果。以上在江南书稿中均有阐释，可以说是到位的。

（二）对新时期新潮作家运用语言，尤其是运用辞格新特点的总结

本书作者揭示的新潮作家笔下的一些修辞现象引人

^① 见本书《导论》

注目。如王蒙受西方后现代派文学观的影响,创作了短篇小说《来劲》,涌现了这类句子:“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B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江南指出:这些语句,显示了“在意义上互相否定,后一个句子的出现总是在解构和涂抹前一个句子”,它所具有的“非理性、非逻辑特点却是传统修辞学不能解释的,既不为它所倡导,也是在它研究的视野之外”。“如何阐释这些新的语言现象,特别是在新的修辞理论中给它们进行一个定位,这是当代修辞学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江南认为,这一段话,“当内容和意义被抽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语言形式了”,而这正是新潮作家的目的所在:“通过瓦解内容和意义,凸显语言形式。”那么修辞效果呢?“小说的语言在相互的解构中除了体现一种幽默之外,那种跳荡的句子、急促的语气也直接展现了一种浮躁之气。”“这种语气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种浮躁的时代环境是完全一致的。”^①应该说,针对这些新修辞现象,本书作者的阐释

^① 见本书《导论》

还是比较恰切的。

江南对新潮作家辞格使用上新特点的阐释，可以说更为详尽。因为每一个辞格在使用中都有着很大的可变性空间，新时期作家们正是利用这一空间，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比較重视感觉和情感的真实，不太重视逻辑的真实。以比喻为例，许多作家觉得只要自己感觉到了、体验到了，就会把看上去几乎完全没有联系的东西放置到一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与其说是基于某个相似点，不如说是作家冥冥之中体会到的一丝感觉。喻体和本体的关系，也不是说明或阐释，而更多地是丰富、补充和发挥。江南列专节探讨了“情感在比喻中的构成与功能”，应该说是有独到见解的。同时，本书作者对夸张的内在机制、夸张两要素的剖析，对莫言和王朔小说中仿拟、摹绘格以及引用格的独特运用等，都有很多精彩的阐释。

与此同时，江南对新时期作家在语言陌生化、杂色化和审丑方面所做努力的总结，也很引人注目。江南指出，传统修辞理论一直将语言的美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追求之一，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美化语言是修辞的主要功能。但在新时期，一些作家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价值观出现了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由审美向审丑的转变，由写人的意识到写人的下意识的转变，于是新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较多的偏重于陌生化、杂色化方面的探索。有些作家则通过描写丑陋，传达对社会和生活的某种特殊认

识。所有这些，也是对新的修辞现象的阐释。

三

本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值得注意，江南所做的实际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即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探讨文学。这也是对修辞学性质——既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介于多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的一种进一步揭示。本书的研究选取了新时期两类作家：一类是借鉴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作家，如王蒙、莫言、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另一类是借鉴中国古典传统的作家，如何立伟、贾平凹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拥有良好的语感，对语言探索有着强烈的兴趣。本书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些作家语言意识的探索，而是把他们放到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探求他们在语言形式上的开拓和创新。但是研究的落脚点，又严格限制在修辞学的范围之内。

本书除了采用修辞学、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比较突出地是采用了心理学的方法。例如本书探讨比喻时，尤其注重情感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以往一些研究者不太重视的，或者即使重视，也只分析其中的褒义情感与贬义情感二目，忽视了情感在修辞中广泛的存在和影响。本书尝试着从喜爱、厌恶、愤怒、悲哀、恐惧和快乐等六种情感出发，分析比喻的情感构成，在学科交叉的研究

中,看到了仅凭纯修辞学研究所看不到的东西。

本书还很重视中西文化的分析和比较,重视民族文化对修辞的重要影响。江南一再论证:各民族的修辞由于文化不同,其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例如思维方式的各异,就使中西修辞显示了较大的分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注重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具象性、模糊性、意向性等特点。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推理的、单向的与明晰的。江南以古代为例指出,我们的古人不但在诗、文、赋、词、曲、小说等多种文体中,大量使用了比喻,即使在哲学、科学和医学著作中,也大量使用了比喻,几乎到了一种不比不说话的地步。如果说西方古代的理论著作是理性的、刻板的,但通常是条分缕析、步步推理的话;中国古代的理论著作则往往是生动的、活泼的,它们总是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行文中夹杂着各种寓言和故事,步步联想,层层比较,作者总是依靠各种修辞手段,将自己瞬间的感悟,巧妙地传达给读者。因此即使是中国早期的不少理论著作,也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学色彩。我一直主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修辞的研究。”^① 我认为江南的这些阐释非常必要,也颇为

^① 郑子瑜、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五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

序

精当。

本书作者不仅总结了新潮作家运用语言的大量成功经验,给人以启示;与此同时,也拈出了这些作家在运用语言过程中失败的教训,也同样给人以启迪。例如以莫言为例,江南赞扬了这位作家在语言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但也同时指出了莫言在“自创新词”方面的失误,如“拼凑语素”、“任意简称”、“重叠语素”、“语素代词”等。同时对莫言“的”“得”混用,“的”误用作“得”以及“的”字误用等方面,通过实例的剖析,立专节进行了批评分析。这就是说,本书作者既概括了正面经验,又拈出了反面教训,通过这样正反两面的辩证论析,相信对读者的启示是会相当大的。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对一批现代作家如老舍、赵树理、孙犁等“没有实现语言自觉”,对他们坚持主张“内容第一,艺术只是第二位”的批评,似乎说服力不强。其实,像老舍等作家,还是比较重视语言表述的,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值得肯定。同时对新潮作家语言观、修辞观赞扬得过多,难道在观点上就没有什么不足的一面?这是需要今后注意改进的。但我认为此书总的还是显现了新意迭见的特色,因此乐于为之作序。

2001年岁末于复旦园

目 录

序	宗廷虎	1
导 论 文学语言的新变与修辞研究的新课题		1

上编 修辞理论研究

第一章 文学语言的感性功能	19
第二章 文化的差异与汉语修辞	30
第一节 从中西文化的差异看汉语的特点	30
第二节 中西思维的差异与修辞的差异	43
第三章 比喻的文化阐释	54
第一节 中西比喻之比较	54
第二节 相似性思维与比喻造词	71
第三节 情感在比喻中的构成与功能	79
第四章 夸张理论研究	97
第一节 夸张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探析	97
第二节 夸张的真实性和逻辑性	108
第五章 “断取”新解	114
第六章 诗歌与修辞	123
第一节 从“格式塔”看诗歌意象的整合	123
第二节 诗歌中的“白描”	133

第七章 原始思维与早期词汇 137

下编 新时期修辞现象研究

第一章 新潮作家语言探索研究.....	149
第一节 语言观念的转变与艺术形式的探求.....	149
第二节 新潮作家的语言探索.....	161
第三节 新潮小说语言的变异.....	176
第四节 新时期小说人物语言的新特点.....	195
第二章 新时期比喻辞格研究.....	206
第一节 观念的突破与比喻的新变.....	206
第二节 比喻的可变性与时代性.....	221
第三章 莫言小说修辞现象研究.....	234
第一节 词语的创新使用.....	234
第二节 仿拟格使用特色.....	249
第三节 摹绘格使用特色.....	253
第四节 语言实验得失谈.....	261
第五节 自造词的几种形式与特征.....	273
附 录 助词“的”使用訾议.....	278
第四章 王朔小说中的“引用”.....	281
第五章 广告修辞研究.....	289
第一节 广告中仿成语的运用.....	289
第二节 广告仿拟格的使用特色.....	296
后 记	305

导论 文学语言的新变 与修辞研究的新课题

由 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修辞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古典修辞学虽然起步甚早,也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经验,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古典修辞学一直没有实现一种明确的学科自觉,没有将修辞与文学批评、文体学和文章学区分开来,没有将修辞建成一门独立的、从属分明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开始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五四”以后,一些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始了现代修辞研究,他们同时汲取了中西修辞两个脉息中的营养,逐渐建立了汉语修辞的体系。其后,因为战乱和各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虽然在较长时间里这个方面的研究进展放缓,但新时期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又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近20年来有大量的论文专著出版问世,人们对修辞的兴趣极为高涨,一些研究者在修辞理论、研究方法、新辞格的创建和单个辞格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新时期以来修辞研究也不是在各方面都尽如人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人们较少注意到作为修辞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语言的可变性,就是没有注意到现代白话文学语言还

是一种非常年轻的语言,它的发展充满了变数,它的演进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时”,或者“正在进行时”。它是一种“在路上”的语言。已有的修辞学更倾向于把这种活的语言当做某种既成的东西加以研究,更重视它的规约性、确定性,而较少注意它的时代性、变异性,有一种搁置新变,将其孤立地进行研究的倾向。

当下,笔者认为应当突出地关注当代文学语言变异性的理据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 现代白话文学语言是一门很年轻的语言,其发展中会不断有一些新质出现,在这种较频繁的变动中,传统修辞理论应不断调整以适应实践的发展

汉语书面语在“五四”时期曾发生过重要的转型,即出现了由文言向现代白话的转型。文言是上古时期的口语;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属于表音文字体系(汉字中形声字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就不是一种表意文字),它一旦记录了某个时代的语言以后就不容易再发生大的变化,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隔膜。白话和文言虽然同属于汉语的系统,但是因为文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趋于固定,没有反映汉语口语的演变,因此它们在语法、词汇、修辞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另外,现代白话与旧白话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以往人们经常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把新白话和旧白话看成一个东西,认为现代白话就是旧白话的延伸和继续;“五四”语言转型不过是对以往文言/白话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倒置,将以往边缘化的白话推向中心,而将在中心的文言推向边缘。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汉语最大的变化是受到了外语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印欧语的影响,汉语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王力先生曾经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太深了,

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它做欧化的语法。”^①“从‘五四’到现在，短短二十余年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②在《汉语史稿》中他又对词汇的变迁作过类似的估计：“从词汇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③王力先生也拿新旧白话作了一个比较，他说：“试把《红楼梦》一类的书和现代欧化的文章相比较，则见前者的长句子很少，后者的长句子很多，这并不是偶然的。西洋的句子本来就比中国的句子长，中国人如果像西洋人那样运用思想，自然得用长句子；翻译西洋的文章，更不知不觉地用了许多长句子。”^④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吸收印欧语的特点嫁接出来的一种语言，它大量地吸收了作为异质语言的印欧语的特点，既区别于文言也区别于旧白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白话是中国人在面向现代化时结合外来因素在汉语系统中创造的一个新的变体，它在语法、词汇和修辞等方面同传统语言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当我们把现代汉语作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到它比较“新”这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充分注意到汉语在20世纪初的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以一种新的面孔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它的新，因此它也会处在不断的变动中，不断地有新质出现。事实上，20世纪初汉语的转型就是由于西语的影响，自那以后，西语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如果说自近代以来西语的影响导致了“五四”时期汉语的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

① 《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

②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58页。

③ 转引自晏乐：《汉语的欧化》，《北京文学》1997年第12期。

④ 《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